

# 坚实的增长基础



Public Disclosure Authorized

Public Disclosure Authorized

Public Disclosure Authorized

Public Disclosure Authorized



## 摘要

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快于世界其他地区，但低于疫情爆发之前。虽然全球贸易复苏和渐趋宽松的金融环境将支持该地区的经济活动，但日益上升的债务、保护主义和政策不确定性可能抑制经济增长。

预计2024年地区增速将从去年的5.1%放缓至4.5%。区内除中国以外的发展中经济体增速将从2023年的4.4%升至今年的4.6%。中国受到债务高企、房地产业疲软等近期问题和人口老化和贸易摩擦等更长期挑战的影响，增速将从去年的5.2%降至今年的4.5%。太平洋岛国由于疫后反弹消退，增速将从去年的5.6%放缓至3.6%。

EAP地区当下面临的宏观经济挑战可能导致有关方面未能充分注意长期增长的微观经济基础方面的问题。过去十年EAP的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驱动，不是来自企业生产率的提高。现在私人投资疲软，生产率下滑，进一步抑制了投资意愿。企业是生产率增长的主角。EAP国家中一些生产率较低的企业正开始赶上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但该地区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未能对新技术加以充分利用，没有实现象国际领先企业那样的生产率增长。例如在电子产品等数字化制造业，2005至2015年间全球前5%企业的生产率增幅比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的头部企业快了两倍半。

EAP地区的生产率增长受到激励和能力两方面制约。对服务业的显性保护和对商品的隐性保护削弱了企业间的竞争和创新动力。技能的欠缺削弱了管理和创新能力。由于财政资源和机构能力有限，利用产业政策来增强激励和能力将十分困难。更好的做法是开放竞争、改善基础设施和改革教育体系——在这些领域采取大胆政策行动可以给地区经济重新注入活力。



## 概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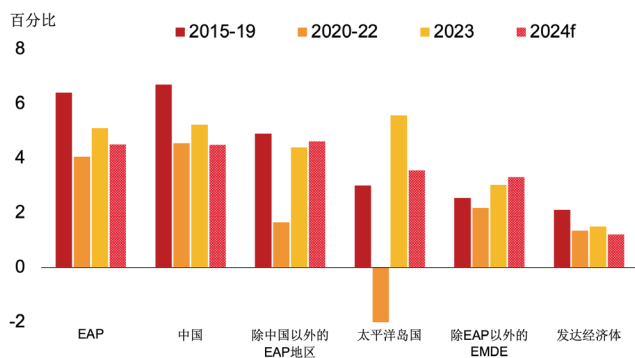
### 增长态势

除几个太平洋岛国外，东亚与太平洋地区（EAP）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正以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速度增长（图01A；表01），但增速慢于疫情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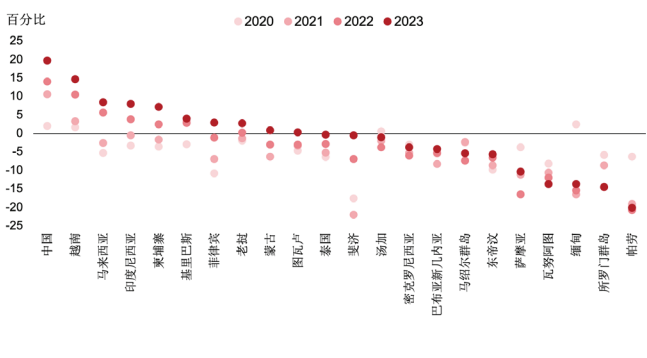
- 预计中国经济增速将从2023年的5.2%放缓至2024年的4.5%。这一方面是由于疫后重启带来的反弹已经消退，同时，债务上升和房地产业疲软等近期问题以及老龄化和贸易摩擦等更长期的结构性因素也会拖累经济增长。
- 东亚与太平洋其他地区2023年的增长受制于贸易增长缓慢和金融条件紧张，2024年预计增长4.6%。全球货物贸易可能出现的反弹以及全球金融条件的逐步宽松有望抵消中国经济放缓对它们的影响。
- 随着疫后反弹的消退，太平洋岛国将向2.6%的长期增长趋势回落，预计2024年增幅将放缓至3.6%。虽然较大的EAP经济体人均产出大多已超过疫情前水平，但缅甸、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帝汶和几个太平洋岛国仍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图01B）。

**图01. EAP地区经济增长快于世界其他地区，但大多数主要经济体增速仍低于疫情之前；大多数太平洋岛国的人均产出仍低于疫情前水平，而且某些国家还在继续下降**

#### A. GDP增长



#### B. 人均GDP相对2019年的变动



来源：《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联合国；世界银行工作人员估算

## 影响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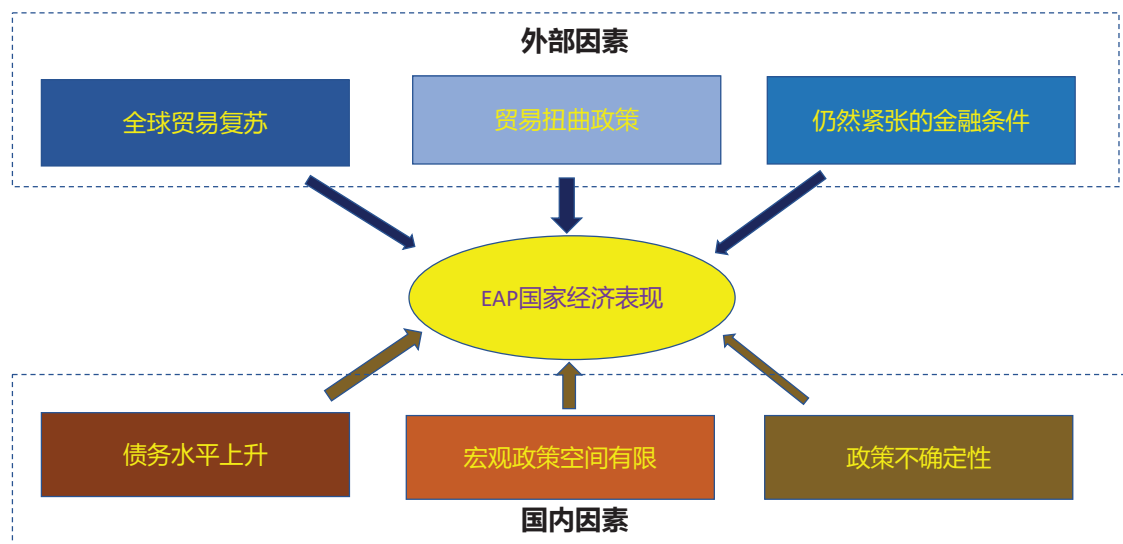
EAP地区的经济表现受到外部环境和国内形势的影响（图02）。主要外部因素包括：贸易复苏，但贸易保护和产业政策有所加强，同时金融条件仍然紧张。重要的国内因素有：公共和私人债务上升；政策立场——尤其是财政和货币政策——受到制约；政治和政策不确定性增加。

### 外部因素

首先，尽管全球GDP增长放缓，但贸易有所复苏。2023年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仅增长0.2%，2024年尽管全球GDP增速将从2023年的2.6%放缓至2.4%，但全球贸易预计增长2.3%（图03）。促进贸易复苏的主要原因是工资涨幅超过通货膨胀、实际收入提高，而且需求从可贸易性低的服务转向可贸易性高的货物。其次，尽管主要经济体的通胀有所下降，但美国和欧盟的核心通胀仍然较高，劳动力市场仍然紧张，这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未来利率仍将高于疫情前水平。第三，2023年各国共实施了近3000项扭曲贸易的新措施，是2019年的三倍。

很大一部分贸易扭曲措施是以产业政策的形式出现。首先，对产业政策使用最为活跃的是二十国集团（G20）国家，如美国、中国、印度和大多数欧盟国家（图04）。其次，除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外，实施产业政策措施的数量也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第三，与同等规模和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EAP国家（除中国和印尼以外）实施产业政策的意愿较低。最后，此类政策的贸易扭曲效果可能会对EAP国家造成影响，因为美国、中国、韩国和日本是其重要的出口目的地，而且被补贴企业往往也是EAP企业的潜在竞争对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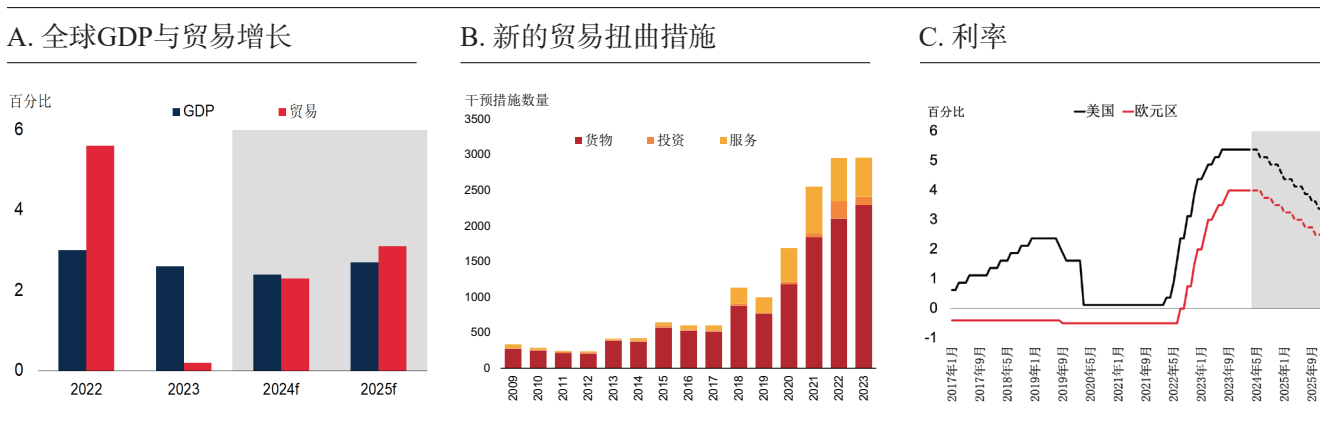
图02. EAP地区的经济增长受到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



来源：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演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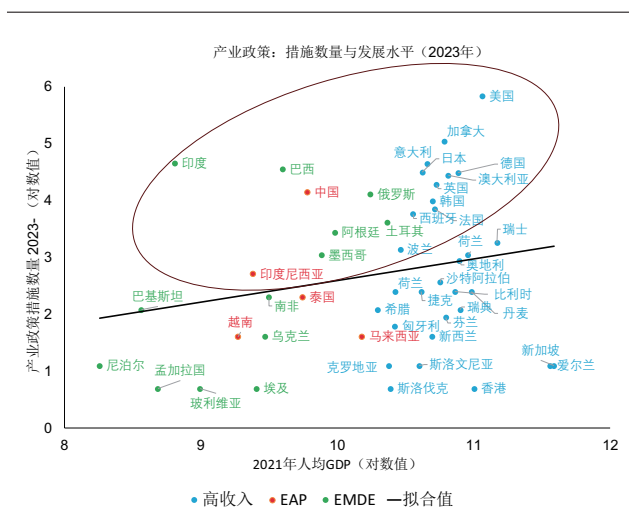


**图03. 三个相互关联的外部因素将决定EAP国家的经济表现：全球贸易复苏，贸易扭曲措施增加，金融条件紧张**



来源：世界银行，全球贸易预警，Haver Analytics，FedWatch  
注：图B显示所有WTO成员新采取的有害措施，根据报告时间滞后进行了调整。

**图04. 富裕国家和大国（即G20国家）是产业政策的主要实践者**



来源：世界银行工作人员根据新产业政策观察数据集（NIPO）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绘制。  
注：根据NIPO的定义，新产业政策既包括国内产业政策，也包括出口促进计划和进口贸易壁垒。所有可能造成贸易扭曲的措施都包括在内。

宏观经济政策

该地区大多数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已从2020-2022年间的扩张立场后退。与前几年相比，预计2023-24 年区内主要经济体将实现结构性财政平衡或有盈余（图06A）。与此同时，为了应对通胀威胁，EAP地区的政策利率有所提高，但仍低于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图06B）——因为该地区总体通胀压力较小，而且各国央行采取了调整准备金率等其他货币政策措施。然而，受大米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进口依赖度高以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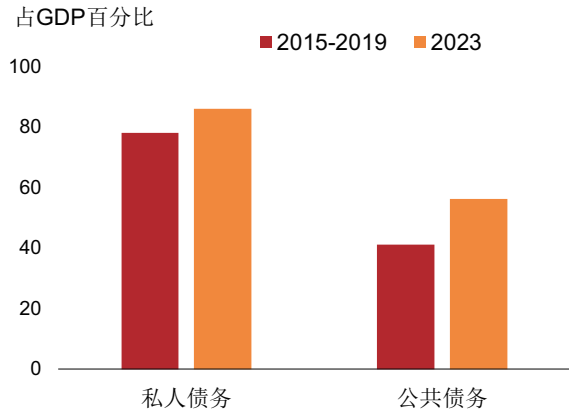
国内因素

债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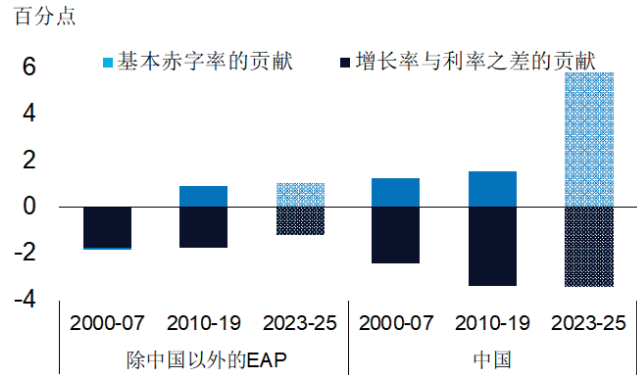
按债务占GDP比重来看，EAP地区大多数经济体的私人 and 公共债务均有大幅增加（图05A）。中国和越南的企业债务占GDP比重自2010年以来已增加40多个百分点，目前已超过发达经济体的水平。私人债务占 GDP 比重每增加10个百分点，投资增长就会下降1.1个百分点。目前中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家庭债务要大大高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此外，由于基本赤字率和利率上升、经济增长放缓，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可能继续上升（图05B）。2023年，老挝等高负债国家的利息支出大幅增加。无论是从不同国家来看，还是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来看，高负债都与经济增长放缓和利率上升相关（参见2021年4月“EAP经济半年报”）。

**图05. 私人 and 公共债务均高于疫情前；基本赤字率上升、利率上升和增长放缓可能导致公共债务占GDP比重继续上升**

A. 私人 and 公共债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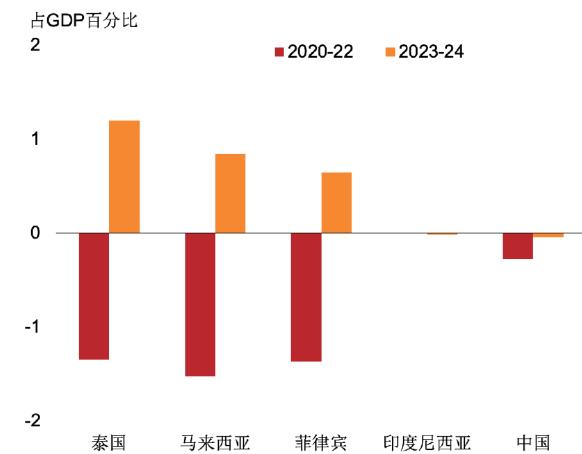
B. 债务-GDP比率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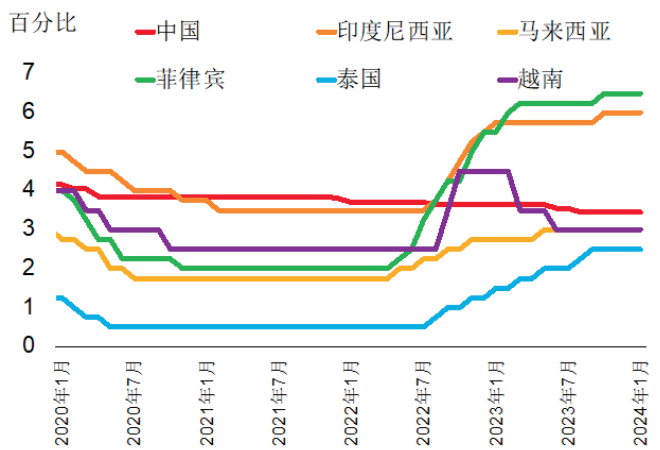
来源：国际金融研究所；世界经济展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工作人员估算  
 注：A. 柱状显示EAP经济体债务占GDP比率中位数；私人部门债务指非金融企业债务。B. 虚线区域为预测。计算方法参见图31注释。

**图06. 大多数国家财政政策扩张性下降，区内除中国和越南以外的国家货币政策有所收紧**

A. 结构性财政余额



B. 政策利率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Haver Analytics



本国货币快速贬值等因素影响，太平洋岛国以及蒙古、老挝和缅甸的通胀率居高不下。而中国和越南由于国内需求疲软和企业部门陷入困境，最近下调了利率。

### 政治和政策不确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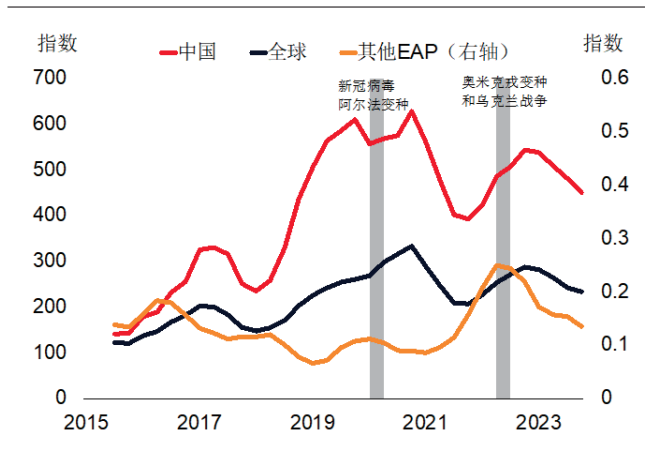
EAP地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近年有所上升（图07）。各国内部的政治事态发展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导致不确定性加剧。由此导致政府政策、市场条件和地缘政治事件前景不够明朗、缺乏可预测性，投资者对投资新项目或扩大现有业务犹豫不决，因而对投资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

### 外部因素和国内因素的影响

该地区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和美国——的增长冲击将通过双边贸易和包括外国直接投资（FDI）在内的金融流动影响EAP经济体（世界银行，2023a）。美国（中国）的GDP增幅每意外下降一个百分点，将导致其他EAP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平均下降0.5（0.3）个百分点（图08A）。美国货币政策的意外冲击也会影响本地区经济增长：美国利率上升25个基点会使本地区增长率下降约0.5个百分点。

图07. 美国和中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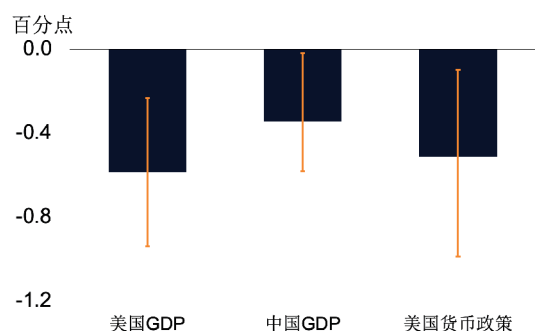
世界不确定性指数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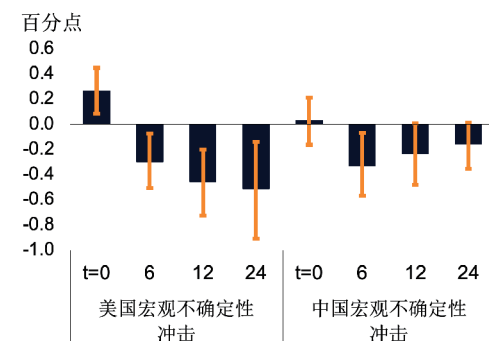
来源：世界不确定性指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注：“中国”曲线显示基于《南华早报》和中国大陆报纸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其他EAP”显示世界不确定性指数中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越南五国四个季度移动平均的中位数。“全球”曲线显示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三个季度移动平均。

图08. 最大贸易伙伴国对EAP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A. 中、美GDP增速下降一个百分点以及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25个基点的影响



B. 中、美宏观不确定性上升一个标准差对EAP工业产出增长的影响



来源：世界银行工作人员估算。  
注：图中所示影响来自对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估算。图A：柱状图分别显示以下冲击的影响：中国和美国经济增速下降一个百分点；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25个基点。其影响系使用结构性贝叶斯VAR模型估算得出。B：柱状图显示EAP产出对美、中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上升一个标准差的动态响应。更多细节请参阅专栏A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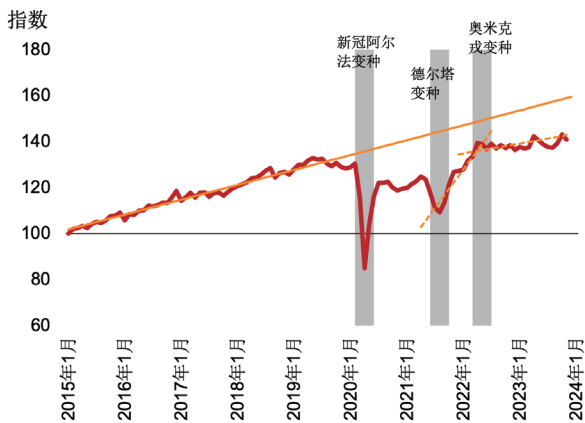
除了美、中两国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动外，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上升也会抑制投资和消费，从而对EAP国家产生影响。美国和中国的宏观不确定性增加一个标准差，分别会导致一年内EAP地区工业产出增长下降0.5和0.3个百分点，资产价格下降3%（图08B）。

### 消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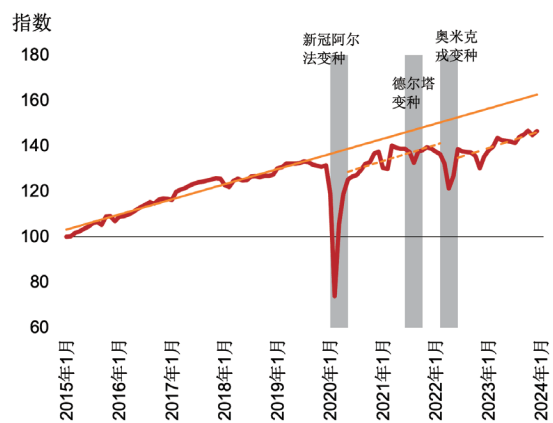
尽管大多数国家的零售额已超过疫情前水平，但大多数EAP经济体的零售增长趋势低于疫情前（图09）。家庭债务上升（如马来西亚、泰国）、房产贬值（如中国）以及政治不确定性增加等因素直接影响了消费者信心，进而抑制了支出。

**图09. 私人消费增长趋势低于疫情前**

A. 实际零售额——除中国以外的EAP地区



B. 实际零售额——中国



来源：Haver Analytics

注：图中显示的是经季节调整后的实际零售额指数，以2015年1月为基线（指数=100）。当没有基于数量的零售数据时，则采用基于价值的零售数据并根据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调整。中国的零售数据中包括了少许服务业。实线为新冠疫情前的趋势线，虚线为2021年1月以来的趋势线。图A显示的是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制造业销售）、泰国和越南的未加权平均值。

### 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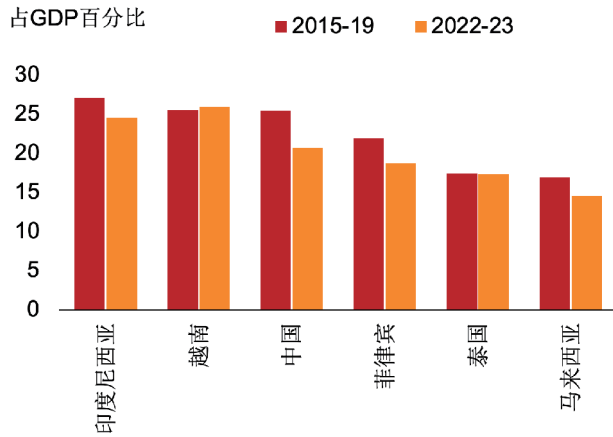
近年来，由于债务上升、利率提高和政策不确定性加剧，EAP发展中国家的私人投资占GDP 比重一直低于疫情前（图010）。在印尼、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公共投资基本支持了疫情期间的经济活动，公共投资占GDP比重超过了疫情前水平。

### 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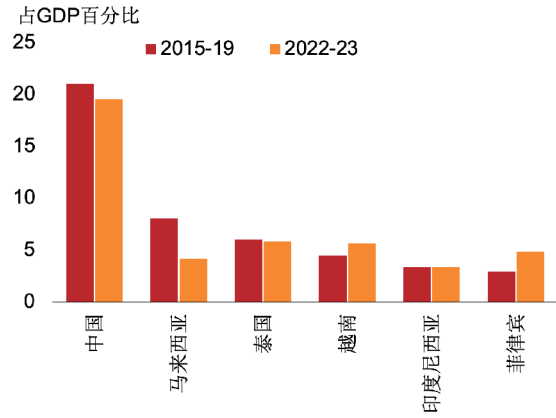
2023年第二季度，印尼和马来西亚的货物出口比2022年同期创下的峰值下降20%以上，中国和越南下降10%以上，但2023年下半年EAP国家的货物出口开始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而恢复（图011A）。截至2023年第四季度，中国、泰国和越南的货物出口已经实现或接近正增长。旅游业的复苏提振了马来西亚和斐济的服务出口，但总体来看游客人数（和旅游收入）的增长已经停滞，但未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原因之一是中国游客数量尚未达到疫情前水平（图011B）。

**图 010. 私人投资占GDP比重低于疫情前，某些国家的公共投资也是如此**

A. 私人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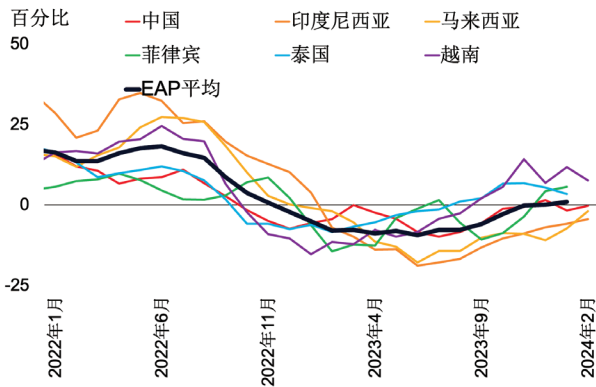
B. 公共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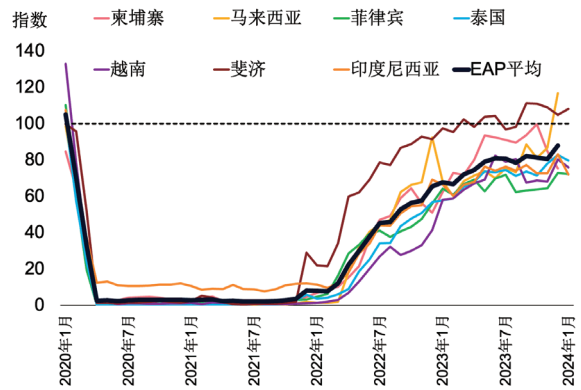
来源：世界银行工作人员估算。

**图 011. 货物出口正在缓慢恢复；数个经济体的游客数量停滞在低于疫情前的水平**

A. 货物出口（年同比增长）



B. 游客数量相对于疫情前的变动



来源：Haver Analytics

注：A. 三个月移动平均。B. 数字为游客数量相对于2019年同月份的指数变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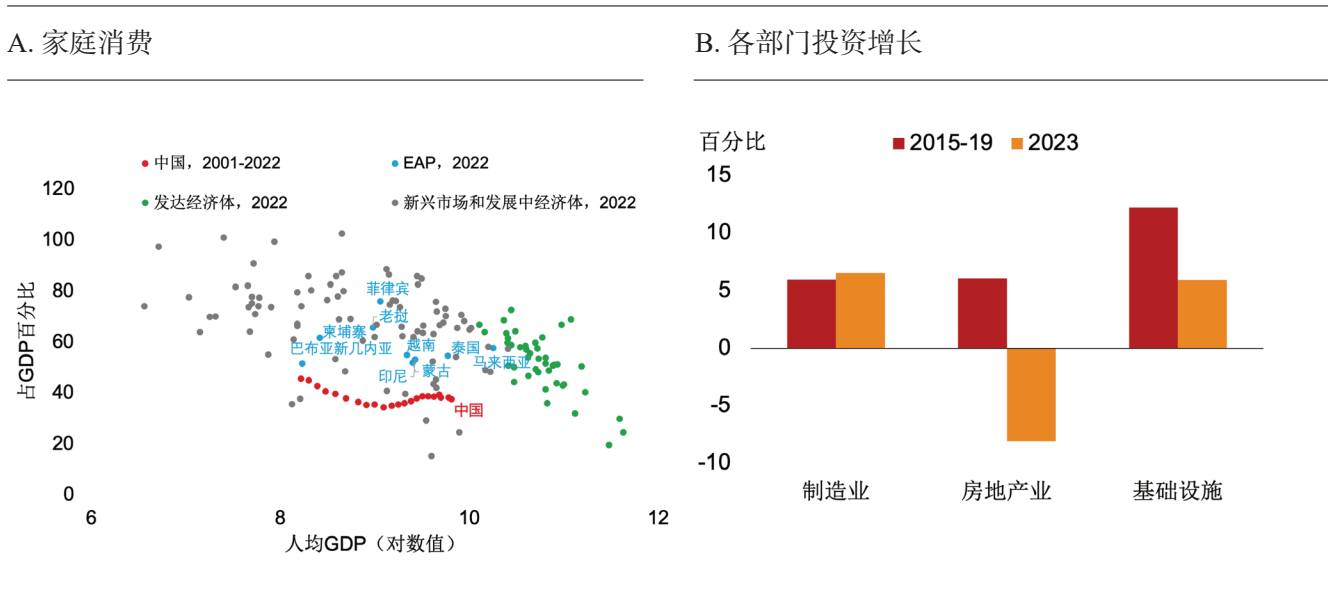
## 中国

中国的增长势头在经历了2023年初的疫后强劲反弹之后已经放缓。通货紧缩压力、产能利用率下降以及劳动力市场低迷都表明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推动中国近几十年来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已显著放缓。房地产市场正在经历漫长但必要的调整，而债务水平高企和投资回报递减制约了基础设施的进一步扩张。中国当前的目标是转向更加平衡的增长道路，但事实证明寻找可以替代投资的需求驱动力并非易事。

中国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是储蓄率过高以及与此对应的国内消费较低（图012A）。中国需要通过高投资率、高出口或高政府支出来维持总需求。过去十年中国的确成功减少了对出口的依赖，将需求来源从外需转向内需。但结果造成了国内失衡，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现在中国正在努力促进投资内部的再平衡，以先进制造业为投资重点（图012B）。但这样可能造成一种新的不平衡，即制造能力与国内和国际需求失衡。

政府宣布了适度的宏观经济刺激来支持总需求。谨慎的宏观经济政策表明，中国政府正努力在提供短期刺激和实现稳定的可持续增长这一长期目标之间取得平衡。解决总需求的结构性失衡不仅需要常规财政刺激，更需要开展有助于减少预防性储蓄的改革——例如加强社会保护和养老金制度、提高税制累进性以及将公共支出从基础设施投资转向人力资本投资等。这些措施可以刺激消费，带来更平衡的增长。与此同时，还应建设透明、可预测的政策环境，对各种所有制的企业一视同仁——这有助于让市场在资本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降低产能过剩风险，同时可以增强投资者信心，鼓励民间投资。

**图 012. 中国的消费占GDP比重继续保持在较低水平；制造业投资加快，但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放缓**



来源：世界发展指标（WDI），Haver Analytics。  
注：A. 图中仅显示人口超过150万的国家。B. 图中显示年增长率平均值。

表 01. GDP增长预测

	2015-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年4月的预测		2023年10月的预测	
						2024	2025	2023	2024
东亚与太平洋地区	6.4	1.3	7.5	3.4	5.1	4.5	4.3	5.0	4.5
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中国除外）	4.9	-3.5	2.7	5.8	4.4	4.6	4.8	4.6	4.7
太平洋岛国	3.0	-10.2	-3.5	6.4	5.6	3.6	3.3	5.2	3.6
中国	6.7	2.2	8.4	3.0	5.2	4.5	4.3	5.1	4.4
印度尼西亚	5.0	-2.1	3.7	5.3	5.0	4.9	5.0	5.0	4.9
马来西亚	4.9	-5.5	3.3	8.7	3.7	4.3	4.4	3.9	4.3
菲律宾	6.6	-9.5	5.7	7.6	5.6	5.8	5.9	5.6	5.8
泰国	3.4	-6.1	1.6	2.5	1.9	2.8	3.0	3.4	3.5
越南	7.1	2.9	2.6	8.1	5.0	5.5	6.0	4.7	5.5
柬埔寨	7.1	-3.1	3.0	5.2	5.4	5.8	6.1	5.5	6.1
老挝	6.6	0.5	2.5	2.7	3.7	4.0	4.1	3.7	4.1
蒙古	4.6	-4.4	1.6	5.0	7.1	4.8	6.6	5.1	6.1
缅甸	6.4	6.6	-9.0	-12.0	4.0	1.3	2.0	3.0	2.0
巴布亚新几内亚	4.0	-3.2	0.1	4.3	2.7	4.8	3.6	3.0	5.0
东帝汶	5.1	-8.3	2.9	4.0	2.1	3.6	4.5	2.4	3.5
帕劳	1.0	-9.1	-13.4	-2.0	0.8	12.4	11.9	-1.4	10.4
斐济	3.1	-17.0	-4.9	20.0	8.0	3.5	3.3	7.7	4.0
所罗门群岛	3.0	-3.4	-0.6	-4.1	1.9	2.8	3.1	1.8	2.7
图瓦卢	6.7	-4.3	1.8	0.7	3.9	3.5	2.4	3.9	3.5
马绍尔群岛	4.8	-1.8	1.0	-4.5	3.0	3.0	2.0	3.0	3.0
瓦努阿图	3.5	-5.0	0.6	1.9	2.5	3.7	3.5	1.5	2.6
基里巴斯	2.5	-0.6	8.5	3.9	4.2	5.6	2.0	2.5	2.4
汤加	2.4	0.5	-2.7	-2.0	2.6	2.5	2.2	2.6	2.5
萨摩亚	3.4	-3.1	-7.1	-5.3	8.0	4.5	3.6	6.0	4.0
密克罗尼西亚	1.9	-1.8	-3.2	-0.6	0.8	1.1	1.7	2.8	2.8
瑙鲁	2.4	0.7	7.2	2.8	0.6	1.4	1.2	2.0	1.5

来源：世界银行；世界银行的估算和预测。

注：以市场价格计算的GDP增长率。小岛经济体2023年增长率为估算值。东帝汶的数值为非石油GDP增长率。以下国家的增长率对应其财政年度：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帕劳和马绍尔群岛共和国（财年为10月1日至9月30日）；瑙鲁、萨摩亚和汤加（财年为7月1日至6月30日）。缅甸的增长率对应的是10月到9月的财政年度。

### 特别聚焦：坚实的增长基础

尽管过去二十年EAP地区的人均收入增长超过了其他大多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但这种增长主要是由资本投资驱动，而不是来自总体生产率的改善（图013）。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可以来自增加资本（资本深化）、（通过教育和技能）改善人力资本或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即生产中可归因于创新的部分，因为它不能用劳动力或物质和人力资本的数量增加来解释）。从长远来看，生产率（TFP）——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效率——是驱动增长的关键。了解EAP地区经济体生产率增长下降的根源有助于设计有助于促进长期增长的政策。

本期半年报的“特别聚焦”通过新颖的企业层面分析考察了生产率增长挑战，分析了导致生产率增长放缓的因素以及哪些政策可以推动TFP这个经济增长关键驱动力的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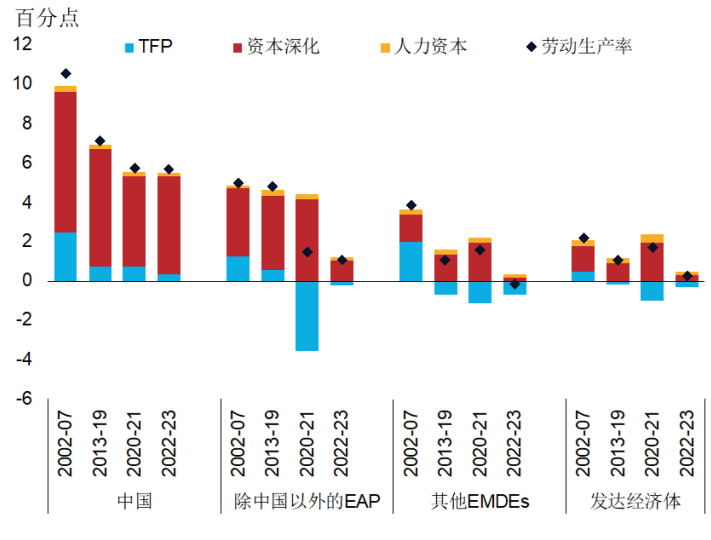
### 企业层面的生产率表现如何？

总体生产率增长是一个动态过程，它涉及：  
 (i) 现有企业的生产率增长；(ii) 市场份额重新分配给生产率更高的企业；(iii) 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图014）。要想开出有助于提高生产率的政策药方，首先要对导致生产率放缓的根源做出正确诊断。

在许多东亚经济体中，生产率增长主要来自现有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图015）。在这方面，该地区企业与其他国家的企业相似——例如美国以及拉美和东欧的企业。由于总体生产率增长大多来自企业内部的生产率增长，因此总体生产率增长放缓可能反映了企业的生产率增长放缓。然而为什么在这个技术快速进步的时期企业生产率却出现放缓？这是一个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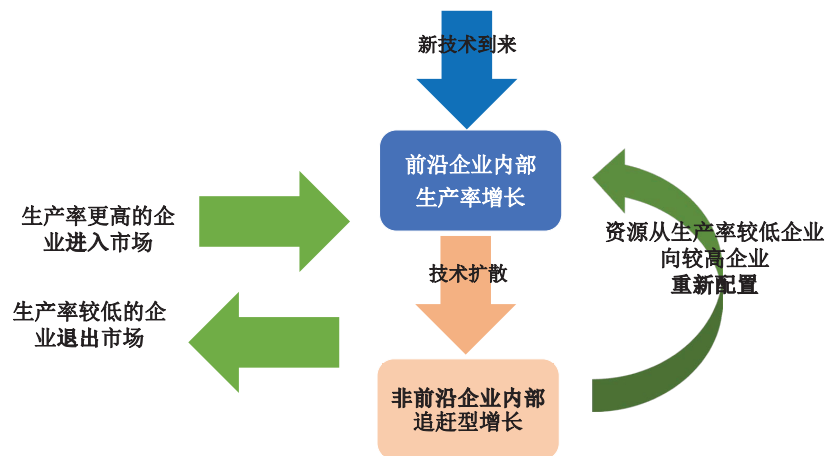
图 013. 地区增长由资本积累而非TFP增长驱动

劳动生产率增长分解



来源：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otal Economy Database  
 注：数字显示未加权中位数（“除中国以外的EAP”反映七个国家的数据）。TFP：全要素生产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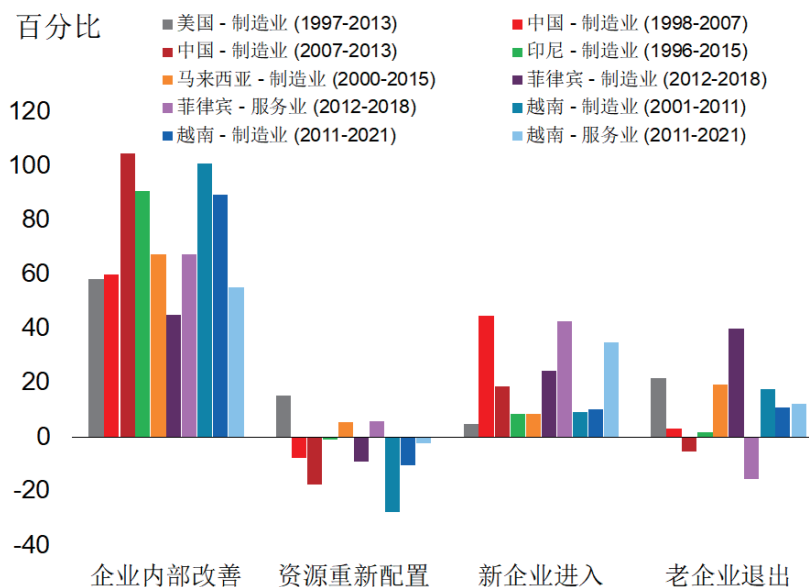
图 014. 总体生产率增长的来源



注：前沿企业指一个国家某个产业生产率最高的企业。  
 来源：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演示。



图 015. EAP地区的生产率增长主要由企业内部的生产率增长驱动



来源：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的数据是由本报告作者使用联合国（??）统计办公室微观数据计算得出，中国的数字取自 Brandt et al. (2020)，美国数据取自 Pancost and Yeh (2022)。

注：图中的分解是按两位数行业代码进行的计算，使用增加值权重进行汇总。图中反映了图例中提到的五年或六年期间生产率变化的平均值（五年还是六年取决于各国的可用数据）。请注意，“进入”只反映新进入市场的年轻企业，不包括因抽样方法变化而新纳入调查的原有企业。

### 前沿企业和后进企业的生产率增长表现如何？

在上世纪90年代，EAP的前沿企业（即一国中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会较早采用新技术，但新技术向其他企业传播的速度比过去放慢（Cirera et al., 2021；Innovation Imperative Report）。这种模式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是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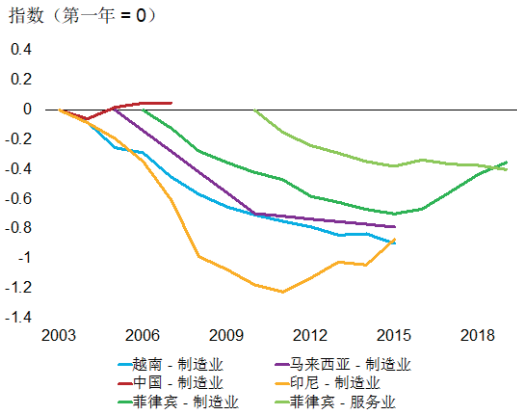
然而近年来，在电子产品等数字密集型行业，EAP经济体各国前沿企业的生产率增长离全球前沿的差距越来越大（图016），而这正是发达国家的最好企业正在撤出的行业。例如在数字化制造业部门，2005至2015年间，全球前沿企业的生产率增长了76%，而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国内前沿企业的生产率平均仅增长31%。在数字化程度较低的行业，国内前沿企业与全球企业之间的差距并不那么明显。这种国内前沿企业的相对停滞在EAP以外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发生，不过程度较轻。由于新技术通常首先被前沿企业采用，然后溢出到其他企业，因此振兴各国的前沿企业对所有企业的未来发展都至关重要。

数据分析等先进的数字技术正缓慢地向EAP地区的国内领先企业传播。东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不如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这一点并不奇怪。然而，EAP的中等企业只是略微落后于发达经济体的中等企业，但EAP的最先进企业却远远落后于全球最先进企业（Cirera et al., 即将出版）。在东亚以外的地区，国内前沿也与全球前沿有差距，但程度没有这么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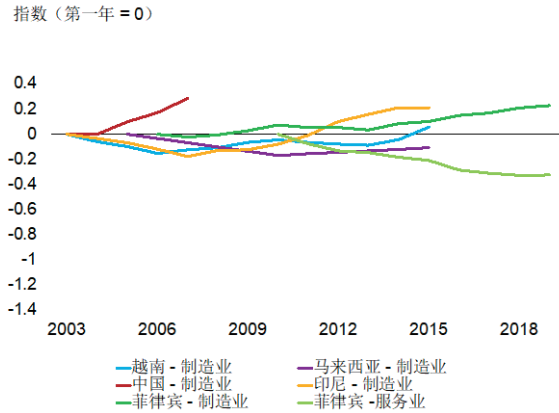
**图 016. EAP国家的国内前沿落后于全球前沿，尤其是在数字化行业**

国内前沿与全球前沿的距离

A. 数字密集型行业



B. 非数字密集型行业



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统计办公室微观数据所做计算，全球前沿数据来自Criscuolo (2023)。  
注：国内前沿的定义同前图（一国内位于行业第90百分位的企业生产率）。“数字密集型行业”采用欧盟统计局的定义。

**为什么本地领先企业不再发挥引领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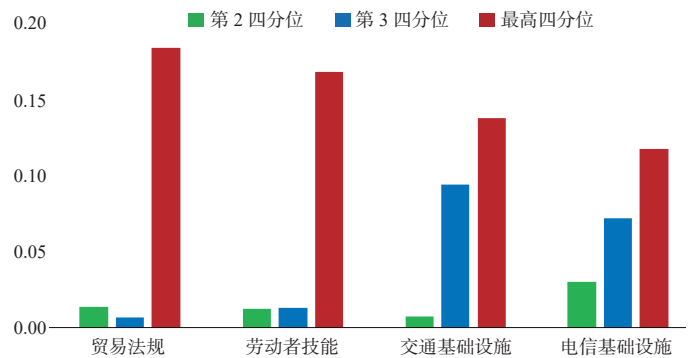
EAP地区在生产率增长方面的相对停滞可能是因为前沿企业没有足够激励，而且所有企业都缺乏相关能力。企业调查显示，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更可能将贸易壁垒、技能匮乏以及运输和电信基础设施薄弱视为制约企业经营的主要因素（图017）。

**企业需要恰当的激励**

缺乏竞争可以解释为什么EAP地区前沿企业生产率增长相对较低。更多竞争（或竞争威胁）会增强前沿企业的创新与发展动力（Aghion et al., 2009, 2021），而开放贸易和投资就可以促进竞争。EAP国家尽管制造业关税相对较低，但农业的关税措施和制造业的非关税措施仍然限制了竞争。此外，中国和印尼的产品市场监管限制性比美国高出50%（OECD）。

**图 017. 生产率较高的企业称贸易法规、劳动者技能和交通及电信基础设施是制约企业经营的重要因素**

各类因素对不同劳动生产率水平企业的制约严重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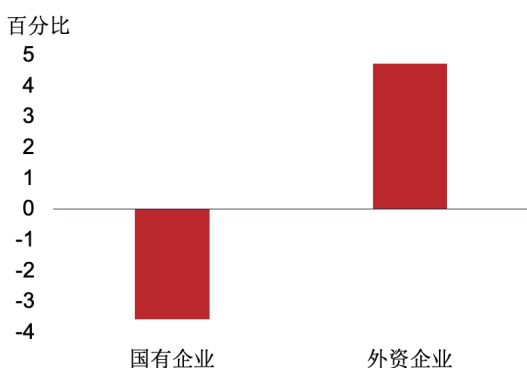
来源：世界银行企业调查。  
注：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四分位数是针对每个国家和年份计算（应用抽样权重）。严重性分数反映了每个四分位内企业对该项制约所报告的严重程度（范围为0到4）相对于底部四分位（生产力最低的企业）的差别。图中呈现的数值是用企业所属四分位对企业所报告的制约严重程度进行回归的结果，控制了公司规模以及国家和年份固定效应。包含13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EAP国家的数据。

某些EAP市场（如越南）由国有企业主导，也会影响竞争环境。过去几十年EAP地区初创企业数量急剧下降（尤其是在数字密集型行业），整个地区越来越多地被老企业充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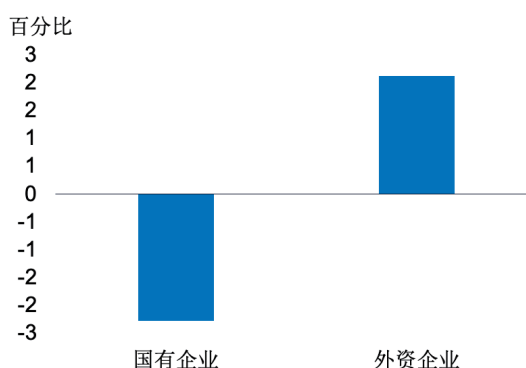
EAP地区面临更多竞争的前沿企业生产率增长更快（图018）。外资所有的前沿企业生产率年增长比其他前沿企业快5%，而国有企业比其他企业慢3%。此外，来自同行业外资企业或国有企业的竞争也会对国内或私营前沿企业的生产率增长产生重要的间接溢出效应。

**图 018. EAP国家的国有企业数量与前沿企业生产率低增长相关，外资企业数量与前沿企业生产率高增长相关**

### A. 直接效应



### B. 间接效应



注：外资企业的直接效应反映了外资和内资前沿企业年度TFP增长率的差异。前沿企业为一个国家和行业内生产率最高的10%企业。外资企业的间接效应反映了外资比例高于10%的行业（以外资企业占行业销售额的比重衡量）内资前沿企业的年度TFP增长率相对其他行业的差异。对国有企业直接和间接效应的定义与此类似。

来源：作者使用（联合国？）统计办公室关于中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微观数据进行的计算。

## 企业需要恰当的能力

提高生产率和采用先进技术需要先进技能和高质量数字基础设施。EAP地区虽然移动宽带已很普及，但不同国家以及各国内部的高速光纤网络设施并不均衡。某些技术（例如电子商务）只需基本的移动宽带即可，但现代数据技术（如数据分析或云计算）则需要高速光纤宽带向客户/供应商/公司内部发送和接收数据，还需要恰当的数字技能和管理技能来实现数据驱动的企业内部决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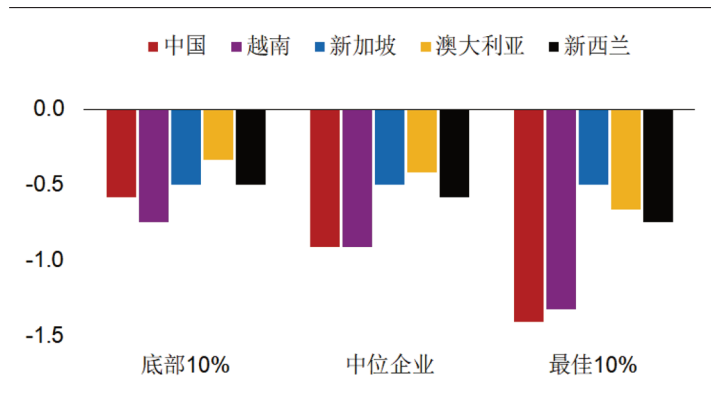
EAP地区获取技能和现代数据基础设施的条件并不均衡。在该地区22个中等收入国家中的14个，一半以上的十岁儿童不能阅读和理解与其年龄相称的文本。即使最基本的数字技能也未能在EAP地区广泛普及，柬埔寨、蒙古、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员工会在文档中使用“复制粘贴”功能。印尼、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泰国和越南超过50%的创新企业表示缺乏管理和领导技能是招聘新员工时面临的挑战（世界银行 2022, Innovation Imperative in East Asia）。EAP地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般企业管理水平都不如美国的一般企业（见图019）；EAP发展中国家中管理最好的企业落后于EAP发达国家中管理最好的企业，并且远远落后于美国管理最好的企业。

### 如何通过政策来推动生产率增长？

有人可能认为能力问题只存在于落后企业，但上一节呈现的证据表明，前沿企业在某些方面的能力也较欠缺——例如管理技能。这里我们将着重讨论为了提振前沿企业的生产率而应在促进竞争、数字基础设施和技能培养方面开展的互补性改革，各国应将这些改革作为政策优先事项。

改革商品和服务市场可以刺激竞争、加快生产率增长。虽然EAP的商品市场相对开放，但放开剩余的关税措施和相对不透明的非关税措施可以增强国内竞争，同时提高企业参与海外竞争的能力。最近一项调查显示，EAP地区55%的出口商认为非关税措施限制了他们拓展新市场的能力（ITS, 2023）。取消服务业的准入和经营限制也有促进竞争的作用（世界银行，2023）。例如，越南的服务业改革使这些行业本身以及下游制造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以上（图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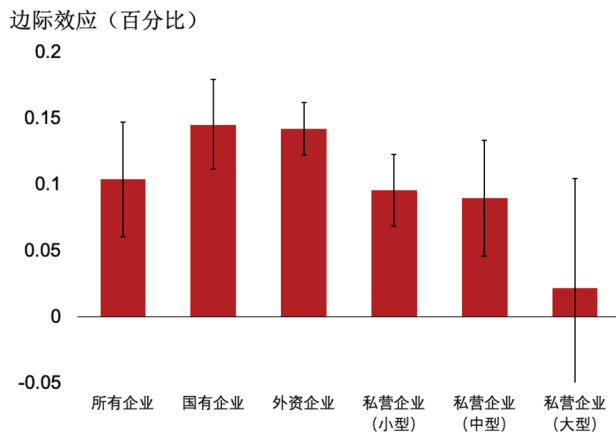
**图 019. EAP发展中经济体管理最佳企业的管理技能水平远远低于发达经济体的最佳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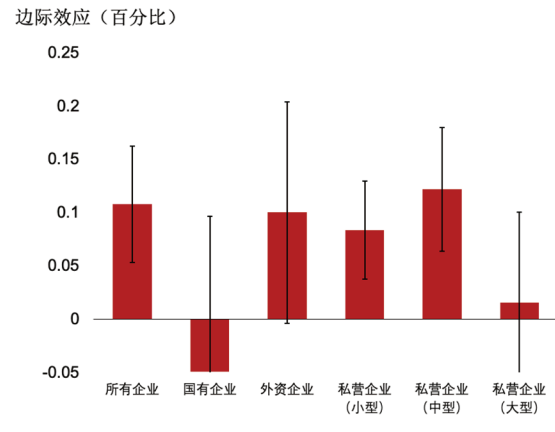
来源：Maloney and Sarrias (2017)，使用了“世界管理调查”数据。  
注：图中“最佳10%”部分反映了EAP国家前10%管理最佳企业与美国前10%管理最佳企业之间的管理得分差距。“底部10%”和“中位企业”部分的数据以此类推。

**图 020. 开放服务业竞争可以提高服务行业以及下游制造业的生产率**

#### A. 服务业改革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自身效应）



#### B. 服务业改革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下游效应）



来源：世界银行工作人员根据2008年和2016年越南企业调查数据进行的估算。

注：OLS回归结果。因变量是2008年到2016年每名工人创造的对数增加值的变化。图A中的主要解释变量是2008年到2016年贸易、运输、金融、专业服务和电信行业“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STRI）的数值变化；图B中的主要解释变量是下游制造业STRI的变化。下游行业的STRI是按以下方法计算得出：对每个两位数制造业门类，按照它对上述五个服务行业的采购价值作为权重对这五个行业的STRI加权平均。图A中的回归样本包括2008年和2016年在贸易、运输、金融、专业服务和电信行业运营的所有企业，图B中的样本包括所有制造业企业。所有回归都控制了企业的基线收入和就业人数。误差项在行业层面聚类。

将加强竞争的政策与改善基础设施的政策与投资相结合可以产生更大影响。菲律宾在12个省推广光纤主干网的初步经验表明，这一举措导致电子商务的使用增加，而这种增加主要发生在拥有优质网络连接的企业和处于激烈竞争行业的企业。行业对外国竞争开放和企业拥有光纤宽带这两个条件各自都促进了技术采用，但二者的综合影响是各自影响的两倍以上。

改善人力资本势在必行，这种改善至少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加强基本技能，这是培养高级技能的基础（世界银行，2023）。教师的知识水平和教学方法都亟待改善。据估计，如果按学生的终生收入现值计算，投资于教师培训所产生的收益将是成本的十倍。

其次，人们必须具备使用新技术的技能以及创新能力。这就要求重视高等教育投资，使劳动者具备更高的认知、技术和社会情感技能。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学生需尽早接触从工厂车间到研发部门的各种工作任务。需要加强研究机构与企业的联系，包括通过为研究机构与产业界的合作提供恰当激励。

第三，要提高现有管理人员的能力。管理质量差异是造成各国生产率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最近的研究表明，管理质量是可以提高的。例如，一些哥伦比亚企业在获得管理咨询服务后改善了管理实践，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Iacovone et al., 2022）。无论是费用高昂的高强度一对一咨询还是企业小组咨询都能给企业管理带来改善且改善幅度类似（8-10个百分点）；企业销售额、利润和劳动生产率都有改进。将这种针对性支持与促进竞争的举措结合使用会格外有效，因为后者可以激发管理者努力提升自身技能（McKenzie, 2023）。







